



致敬那一代人的理想信念

——关于长篇小说《炬火擎》

阎晓明



于我而言,《炬火擎》这部小说是出于神圣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而创作的。

1961年7月,中共天津建党纪念馆在和平区长春道普爱里21号设立,10岁的我随姥姥和父母前往参观,方得知外祖父于方舟是天津早期党团组织的重要负责人,也是一位革命烈士,27岁便牺牲了。当年8月18日,母亲在《天津日报》发表《回忆父亲于方舟的二三事》,我详读数遍,进而了解了于方舟事迹中的一些细节。1966年,我前往河西走廊的甘肃农建十一师,加入戍边垦荒的队伍时便随身带了这份剪报,此后在甘肃工作的25年间一直带在身边。依据积累的资料,建党60周年时,我写了散文《热血之歌》发表于《冀东文艺》。1991年调回天津后,因工作繁忙暂未

就此题材写过什么。1998年,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开馆后,母亲将她珍藏多年的邓颖超书信捐给了纪念馆。那是邓颖超1953年12月19日写给母亲的复信,信中写道:“文郁同志:收读你12月10日来信及附件,我非常高兴。”“等我健康恢复后,即尽力将你父亲略传校正后寄还你。”(见《邓颖超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18页《致于文郁》)这封信令我非常震撼,母亲居然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日子里,就已收集整理于方舟的资料了。不久,父母将他们整理的所有资料都交给我。我问母亲为什么要收集这么多资料,她说:“家里供你姥爷上大学,他却抛家舍业,27岁就早早牺牲了。村里现在还有人说他是个‘败家子儿’。我是他唯一的孩子,必须找到证据,弄清他为啥不顾你姥姥和我,非去牺牲?告诉人们,你姥爷这样的人,是‘败家子儿’还是‘民族脊梁’?”

母亲的话,令我感到肩头使命的分量,自此,我也开始注意收集整理外祖父和他战友们的资料,以解开他们“非去牺牲”之谜。此后,陆续发表过一些关于外祖父事迹的短文,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时,于方舟的诗句为题,写了一篇两万字的论文《咏出新乐府响彻行车间——于方舟烈士五四运动时期诗作创作研究》,被收入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编纂的《在文学与历史之间: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迎接建党100周年的时候,我萌生了用长篇小说讲述于方舟故事的想法,经提交大纲、试写“样章”,后专心创作,小说于今年9月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

津派文化大家谈

关于甲骨文发现者的争论,目前学术界多集中于北京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和天津秀才王襄、书家孟广慧这三个主要人物。对于京津两地这两说,究竟应该作何选择,实在不好作非此即彼、一优一劣之简单判断。因为两者都有一些含混和矛盾的地方,比如两说中,都有年代相互出入和矛盾的地方,如分别有戊戌、己亥、庚子等不同年份的考证等。所以那些两说兼顾的学者观点,我们决不能视为和稀泥式的骑墙之论,而是在目前情况下的一种明智的做法。

实际上早期的甲骨学者,他们自己并不在意谁是甲骨文的发现者,没有什么争名夺利的思想。如王懿荣、王襄、孟广慧等,他们自己并不立文字,而是待后人评说。即使到了

后题字:“古人多有自为著述,且见某人撰述与己所见同,且高于己,即置笔而让之,或襄助赞补。余今于治殷文字之学,见纶阁二弟此著,其有同情乎?西人古之学者亦多此悒。余为此学二年,实不逮我纶阁之精且细,今而后将以此一得附于此书,亦涓埃之益,则吾昆弟二人可成此业,不但为余二人之幸,亦上古文字之幸也。当共勉之。戊午六月,福山王崇烈展阅并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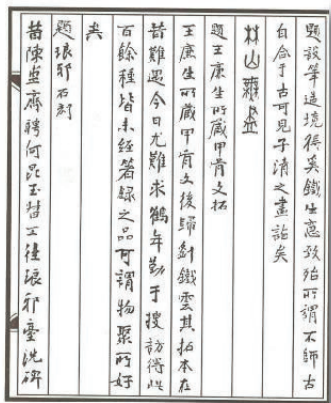
9月,王襄见王崇烈所藏《殷虚书契待问编》(罗振玉编),后者自作释文,遂借归拜读抄录,并题词曰:“余集贞卜文字书成,阅汉辅兄治斯学有年,因就正之,冀有所理董也。出其所释《殷虚书契待问编》各文授襄,噫!汉辅兄于此学致力深矣。录副于册,以原书归之。遂值八月,纶阁记。”

不仅如此,王襄在自己的文集中多次提到

甲骨文与天津(三)

京津两地早期甲骨学家

朱彦民



王襄先生写作《簠室殷契类纂》和《簠室殷契征文》这两部甲骨学著作之时,也是这样。此时甲骨学研究还不成规模,对于像甲骨文发现者及谁先后谁这样的问题,不管是罗振玉也好,王国维也好,并没有做多少追究。这从他们的一些甲骨学论著中对此事的含糊其辞和前后矛盾之处就可以看得出来。所以王襄此二书的写作与出版,并没有想到在这些方面与人争短长。就是王襄先生后来有了关于甲骨文发现的记述,也是自然地讲述自己收藏的经过,并不说自己或谁谁是第一发现者等话。这也可见老一辈学人的治学风采。而后来的所谓第一第二、谁先谁后的争论,恐怕均非第一代甲骨学家的本意。

从现有甲骨文发现的早期文字资料来看,京津两地的情况略有不同,天津的学者知道北京的情况,即王襄、孟广慧购余之甲骨被卖到北京王懿荣处;而北京学者则未必知道天津的情况,所以北京学人的早期记述中绝口不提天津之事,致使世人只知北京王懿荣发现了甲骨文而对天津学者的事功知之甚少。这是两种说法都没有注意到的一点,也是没有交代清楚的关键所在。

实际上,王懿荣、王襄、孟广慧虽然睽隔京津,但他们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尤其是作为晚辈的王襄、孟广慧对王懿荣非常尊敬。

如前所述,甲骨出现在天津时,孟广慧经济拮据,限于财力,未能购买到那片著名的“半龟腹甲”,古董商拿到北京卖给了王懿荣。孟广慧对这片甲骨十分钟情,不能忘怀。为此,他特请王懿荣次子、当时任天津候补道员的举人王崇烈(字翰甫,汉辅)写信介绍,于1899年初冬专程赴京拜访王懿荣,得到王的热情接待,孟在王处见到这片“半龟腹甲”。

王襄青年时期就喜爱收藏,原有室号“符斋”,后来因为获藏王懿荣旧藏白旅簠,故改号为“簠室”。同时,王襄也和在津生活的王崇烈交往甚密,时时切磋,交换甲骨学研究

王懿荣,或为李鹤年搜求的王懿荣旧藏甲骨拓本作序言,如《题王廉生所藏甲骨文拓》(上图):“王廉生所藏甲骨文,后归刘铁云。其拓本在昔难遇,今日尤难求。鹤年勤于搜访得此百餘種皆未經著錄之品可謂物聚所好矣。”或题跋其信札书法册页,如题《王莲生书牍册》:“此册为王莲生致同乡尹慈经之函件,内多言古物之事。昔其子汉辅言公于通候信札认真,不信手涂抹。当时盛伯兮、黄仲弢两先生尝谓,公之信札及团折扇,为专门名家。册中书不成字一言,可见公之经意。公殉庚子之难。兹将庚子辛亥忠烈像赞所书小传,附录于后。”或尊崇其气节道德与金石学问,如《庚子辛亥忠烈像赞》,限于篇幅,此略不录。

凡此种书,我们从中正可见在甲骨学史初期,京津两地早期甲骨学家之间惺惺相惜、敬佩对方道德学问的古人之风。如今,推究甲骨文发现者究竟是谁,从而形成的两说并立局面,似乎成了甲骨学研究上的难题。这恐非两个王家人当初所愿意看到的结果。

其实对于甲骨文发现的这两种主要说法,也许并不矛盾。我们完全没有理由怀疑早期学者的道德文章以及对学术事业的真诚,因此他们遗留下来的关于甲骨文发现的有限记载,已经成为无可置疑的珍贵资料。他们之间的记述之所以会有相互抵牾或颇不相能的地方,很可能是限于当时他们所掌握的材料不足或者信息的不够灵通。我们如果综合这些材料进行研究,用来复原甲骨文发现过程和早期甲骨学史,相信将会得出一个较为全面和真实的结论。

关于书名。首先想到的是李大钊先烈《青春》一文和其中的名句“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李大钊是于方舟的革命引路人、入党介绍人,他的思想、人品、文章对于方舟影响至深。向着真理之炬燃亮的光明奋进,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光明愿景高擎着火炬“进前而勿顾后”,正是他们那批有志青年和共产党人的精神写照,“炬火擎”应该可以体现全书的主题。还以于方舟所写文章中“从黑暗中,死之道路外,另寻一条烟火”的句子作为参考,通过这15个字,可以感受到理想信念的炬火、革命道路的炬火、党的事业的炬火,对他们那一代人至关重要,所以小说取名《炬火擎》。

关于结构与形式。没有平铺直叙地依时间轴从主人公的童年少年一直写到牺牲,因为于方舟在这个世界仅仅停留了27年,顺时针写似乎少了些厚重,便以他牺牲前在图囿之中受尽严刑拷打、威逼利诱时一段段的回忆,分述人生中最具亮点、最具可读性的故事。原来狱中生活部分是以第三人称写的,后又按本书责编老师的建议改为第三人称,就不会显得那么青涩与轻飘了。

关于史实。按革命历史题材“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大的历史事件、主要历史人物的生平事迹,都是真实可考的。为增强作品的戏剧性、可读性和色彩,虚构了一些细节,如于方舟帮助民间艺人编写时调中的歌词,后又以这种形式宣传革命思想等。

关于人物塑造。本来想写中共天津早期党组织创建前后历程中的多组人物,责编老师嘱我集中写好于方舟,我便将笔墨集中于于方舟和他最亲密的同学、战友及家人身上。为写出人物的独特性,首先考虑于方舟身份的特殊性。他大量工作是隐秘的,但还有很多场合是公开的,当年《益世报》《大公报》有很多关于他的新闻报道,五四运动中,他与周恩来、马骏等被捕代表出狱时的合影更是公开到世人皆知的程度,虽然他用过不少化名,也曾不停地留胡子、刮胡子,可无论对姓名到形象都无法做到完美的隐藏与掩护。这一特性就会使得故事能够有跌宕起伏的发展。以往记者采访我时,经常会问到于方舟和妻子之间的故事,是不是志同道合的大学同学或革命战友,我总会说没什么故事,她就是一位不识字的农妇。但没文化不等于没有志向、胆识和智慧,于是便有了小说中的谈芳荪,也许还算是一个出新的文学人物呢。



青幽览胜(中国画) 王少桓



第五四九二期

天路之上 丰年正好

王霞

一双脚翻越这样的山,蹚过这样的水。我站在隧道口停车区,想象当年那支队伍走到这里时,是怎样的心情和神态。这脚下的路,是他们一步步踩出来的,也是他们顶后人一点点修出来的。

高原的路被称为天路。路是修出来的,这话的分量在这里很重。那天在垭口比较兴奋,活动量大了些就感到胸闷头胀。先生催着我上车吸氧,不由得想起,当年修这条路,修路官兵和工人不知吃了多少苦!后来遇到道路维护停车等候时,和管控的工人聊起家常。他说一年到头守着这段路,冬天下雪除雪,雨季塌方抢通,是他们工作的常态。我连说太苦,他咧嘴一笑:“路通了,牧民放牧,学生上学,你们旅游,都方便,这就值了。”

那一天从贡觉到察雅,途经哈加乡。车到河谷,映入眼帘的是一层层铺到山脚的金黄青稞麦浪。田里几台小巧的农机来回穿梭,收割打捆一气呵成。

90 长征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

熟知吉鸿昌的读者,大多记得他“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的就义诗篇,记得他“我是中国人”的民族气节。然而拨开史料层层尘埃,我们会看到,吉鸿昌不仅是一位慷慨赴死的爱国将领,更是一位有着宏大战略视野的革命者。在中央红军踏上战略转移的艰苦征途之前,身处天津的吉鸿昌,曾试图以中原暴动、开辟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宏大计划,策应红军北上抗日的大局。

1932年2月,结束海外“考察”归国的吉鸿昌,内心已经彻底摒弃追随国民党打内战的旧道路。他厌恶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一心寻求抗日救国之路。当年8月,吉鸿昌化装潜入鄂豫皖苏区,希望能够投身红军,直接参加革命斗争。在苏区停留期间,他与中共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等人深入交谈,徐海东负责接待护送。当时苏区斗争环境极度险恶,敌我力量对比悬殊,红四方面军主力正面临国民党重兵第四次“围剿”的巨大压力。经过充分研判,苏区党组织向吉鸿昌阐明现实:以个人身份留在苏区参加红军,能够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吉鸿昌曾执掌西北军,在旧军队上层、中原与西北地方武装当中拥有深厚人脉资源,如果回到国民党统治区,利用自身社会影响力开展统战与兵运工作,联络各方反蒋抗日力量,可以对革命事业产生更大价值。经过审慎思考,吉鸿昌接受了党组织的建议,告别大别山,返回北平。

这次鄂豫皖之行,成为吉鸿昌人生道路的关键转折点。他放弃直接加入红军队伍作战的想法,选择回到白区开辟第二条战线。恰在这一时期,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被迫撤离大别山,向西实施战略转移,徐海东等人留守苏区,不久,红二十五军在湖北黄安(今红安)重建。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挥师西进,也踏上漫漫长征路。吉鸿昌虽然与红军长征“失之交臂”,却在数千里之外的华北,开启了一条与红军遥相呼应的革命道路。

1932年秋,由中共华北政治保卫局负责人吴成方作为入党介绍人,吉鸿昌在北平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式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把自己的生命交付给民族解放事业。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失败之后,1933年底,吉鸿昌辗转回到天津,花园路5号那座红砖小洋楼成为他筹划革命事业的重要阵地。

天津作为当时北方工商业中心,租界林立,各方军政势力交错,中共地下党在此拥有开展秘密工作得天独厚的地缘条件。吉鸿昌购置的花园路红楼,外表看上去只是一座安静雅致的英式住宅,楼内却暗藏玄机,多处房门互通,设置密室,三楼改造为秘密印刷场所。这里成为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下重要的地下联络站,无数关乎北方抗日的

1934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推动下,“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在天津正式成立,吉鸿昌担任主要负责人。红楼成为大同盟的核心活动据点。在南汉宸、宣侠父等共产党人协同之下,吉鸿昌在这里开展多重革命工作。

事实上,就在筹备成立大同盟的同时,一份宏大的武装斗争计划也逐步成形,这就是中原暴动方案。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重兵,对中央苏区发动规模空前的第五次“围剿”,红军处境艰难。原吉鸿昌所属国民政府第二十二路军改编而来的第三十师、第三十一师,编入孙连仲第二十六路军序列,调往江西战场参与“剿共”作战。这两支部队的基础是西北军旧部,不少中下层官兵感念吉鸿昌旧恩,厌恶内战。吉鸿昌经党组织批准,派遣地下工作人员秘密潜入江西前线,联络旧部官兵,策划策动部队阵前起义。如果计划顺利,起义部队脱离“围剿”战场,向北突围返回河南故土,会合中原地方武装组建抗日义勇军;之后向西进入陕甘地区,与杨虎城所部力量会合,开辟西北抗日根据地,争取和红军在陕北的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大西北的抗日格局。为落实这套计划,吉鸿昌派出交通员茹志章秘密奔赴西安,与杨虎城进行联系。杨虎城对吉鸿昌的抗日主张表示认同,暗中给予经费支持,约定暴动起事之后予以军事接应。整套战略构想,与红军摆脱“围剿”、北上抗日的历史大势高度契合。一旦中原暴动成功,不仅可以直接减轻中央苏区承受的军事压力,还能在西北打造一块新的抗日武装据点,推动全国抗日局面提早到来。

为了进行抗日宣传,吉鸿昌等在红楼三楼秘密印刷所印制《民族战旗》等抗日救亡刊物和宣传材料,这些刊物和材料冲破国民党的舆论封锁,传播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治主张。吉鸿昌还变卖家产,筹措经费,购置武器装备,接待全国各地前来联络的反蒋爱国力量,搭建起覆盖军政各界的抗日统一战线网络。

短短几个月时间内,吉鸿昌重举武装抗日大旗的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但此时一场灭顶之灾已悄然降临。1934年11月9日,吉鸿昌在天津法租界国民饭店开展会谈之时遭国民党特务袭击受伤被捕,不久,他被秘密押解到北平。11月24日,吉鸿昌英勇就义,年仅39岁。中原暴动、策动旧部起义、建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全部宏伟计划,随着英雄牺牲戛然而止。

吉鸿昌牺牲的消息传到西安,杨虎城内心万分痛惜,但在国民党严密监控之下,他不能进行任何公开悼念。根据当年参与联络的地下工作人员回忆,杨虎城对蒋介石残害爱国将领的行径无比愤慨,这次事件让他更加坚定了联共反蒋抗日的信念。两年之后,1936年12月,杨虎城与张学良共同发动西安事变,在已胜利完成长征、建立陕北革命根据地的中共中央英明决策下,促成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大局。

长征是红军主力用脚步书写的伟大远征;而吉鸿昌在天津所做的地下斗争,是另一条战线上伏枥千里的遥相策应。他尝试在敌人后方点燃武装抗日的火种,试图以兵运、统战、暴动的方式,配合红军摆脱“围剿”、北上抗日的战略大局。虽然壮志未酬,但他的理想并未消散,他的心始终向着红军、向着抗日救国的方向。

吉鸿昌与长征的千里遥应

刘铁男



田野里堆着一垛垛青稞捆。藏族农民正在田间忙碌着,把青稞捆装上农机车,堆得高高的,总有一个人坐在上面,多半是女子,因为那天是周末,所以也有孩子。看到我举着手机拍照,他们便笑着朝我挥手,丰收的喜悦扑面而来。地头的老人说,他年轻时种青稞靠“二牛抬杠”——两头牦牛共抬一根横木,肩背发力牵引犁具,后面有人扶犁耕地,一天种不了几亩地;如今这些铁家伙平天的“劳作”成果顶他过去半个月的劳动量。老人说得平静,眼睛却是亮的。

山坡上散落着牦牛,有的牦牛上得路来,大摇大摆。先生停下车安心等着,牧人骑着牦牛过来打招呼,黝黑的脸上笑容暖暖。在海拔4200米的黑湖边,也遇到过这样的牧人,为我指了路的方向,还请我喝酥油茶。

距国庆节还有半个多月的时间,我在高原,一路都是欢喜的。山还是那些山,路已不是那些路;青稞熟了,农机响了,牧人的孩子进城念书了。从前想都不敢想的事,如今都摆在眼前。前人替我们铺好了路,我们赶上了好时候。我自江南赴高原,一路见路通、见粮丰、见人笑,心中满是感慨。山河依旧壮阔,一代代人耕耘铸就的坦途,正见证着家国岁岁安好。

于2026年9月13日